

中国自然灾害幸存者创伤后成长的质性研究 ——舟曲泥石流后对幸存者的访谈分析

吴恺君^{1,2}, 张雨青¹, 青于兰^{1,2}, 陈正根^{1,2}, 刘寅^{1,2}

(1.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北京 100101;2.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摘要】 目的:探讨舟曲泥石流幸存者创伤后成长特点,并比较其与西方幸存者表达的创伤后成长的差异。方法:以2010年8月7日舟曲泥石流灾区为例,运用目的性抽样的方法,对63名幸存者进行了个案访谈,收集了他们在灾难后感知到的创伤后成长相关资料。结果:中国自然灾害幸存者创伤后成长发生率高,其内容包含七个维度(积极信念、生活的积极改变和新的计划、利他行为、积极的自我感知、感激、珍惜和人际关系改善),其中利他行为维度未包括在Tedeschi和Calhoun提出的五因素模型中。结论:中国文化背景下创伤后成长有其独特之处,这与其对宗教的认同度和文化因素的差异有关。

【关键词】 创伤后成长(PTG); 自然灾害; 质性研究

中图分类号: R39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611(2013)03-0474-05

A Qualitative Research of Posttraumatic Growth in Survivors of Zhouqu Mudslide

WU Kai-jun, ZHANG Yu-qing, CHEN Zheng-gen, LIU Yin, QING Yu-lan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dimensions of posttraumatic growth(PTG) under Chinese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compare them with those under Western cultural background. **Methods:** With purposeful sampling, a sample of 63 survivors from Zhouqu County was interviewed with five questions. **Results:** Every survivor of this research expressed items about posttraumatic growth, and it contained seven dimensions, including positive beliefs, positive changes and new plans of life, altruistic behavior, positive self-perception, appreciation, cherish and development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mong those dimensions, altruistic behavior hadn't been mentioned in any other models developed before. **Conclusion:** Posttraumatic growth under Chinese cultural background has its unique features, and they may be affected by social cultural factors like religious identities and collectivism.

【Key words】 Posttraumatic growth(PTG); Natural disaster; Qualitative research

近年来全球自然灾害频发,灾难对个体造成的心理影响逐渐受到了各方面的关注。然而,研究者主要关注自然灾害给受灾人群所带来的消极心理影响,如创伤后应激障碍、急性应激障碍、焦虑、抑郁和睡眠障碍等。而灾难性事件对个体不只会带来痛苦和负性的影响,幸存者在灾难后的生活采取应对策略的过程中,也会发生积极的心理变化,并获得一定的个人心理成长,即所谓的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PTG)^[1]。

PTG这一概念早在20世纪末已被提出,在不同的研究中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但均被用来描述在应对生活中的挑战的过程中所获得的积极心理改变^[2]。研究^[3]表明经历过创伤性事件的幸存者都会出现PTG,其发生率为2%~98%不等^[2]。除此之外,国外

研究者已经开始对PTG的心理机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广泛的研究^[4-7],并编制了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PTGI)、Stress Related Growth Scale(SRGS)、The Perceived Benefit Scales(PBS)等关于PTG的测量工具^[2],提出了一系列PTG模型,如Janus双面模型、意义建构模型、生活危机和个人成长模型等^[8]。目前被广泛接受的为Tedeschi与Calhoun在1996年编制的PTGI量表及同时提出的五因素模型,该模型提出创伤后成长包括五个维度:人际关系的改善,日常生活中出现新的可能性,积极的自我感知,精神信念的积极变化,对生活的感激和珍惜。

随着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逐步深入,研究者们意识到由于文化差异(如中西方文化中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差异),不同国家或民族的幸存者即使面对同样的灾难也会产生不同的认知和应对方式^[9]。有研究^[10,11]显示,澳大利亚和日本被试在PTGI中精神改变分量表的得分要低于美国被试。对中国香港被试的研究^[12]显示其PTG符合二阶二因素模型,包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自然灾害幸存者的创伤后成长心理机制及其干预的研究”(71073156);北京市重点学科(应用心理学,2008~2012)资助

通讯作者:张雨青

括个体成长和人际成长两个维度,而个体成长中又包括自我、精神和生活方向三个维度;对土耳其被试的研究结果^[13]则支持三因素模型,包括人际关系、生活哲学和自我感知三个维度;更大范围的 meta 分析结果^[2]也提示并没有固定的维度分类适合所有文化中创伤后成长的表达。而少量日本和中国的质性研究^[14,15]也提示该文化背景下个体表现出的 PTG 有其独特之处,如东方文化下创伤后成长会表现出利他行为,而在西方文化下则表现为对宗教的虔诚。综上所述,探寻特定文化背景下的 PTG 特点并建立模型开发测量工具比一味追求普适性更有意义。

在中国,有关 PTG 的研究大多基于国外研究结果,使用的量表也都来自西方^[16,17],而基于中国文化背景的开放性质性研究却鲜有涉及。为全面了解中国文化背景下灾后幸存者 PTG 的内容及特点,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半结构式访谈了解中国文化背景下灾后幸存者创伤后成长的内容与特征及其与西方文化背景下个体表现的异同点。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舟曲板房为调查场所,于舟曲泥石流(2010年8月)后10周通过入户访谈方式,对63名幸存者进行了深入访谈。

采取目的抽样,根据课题组前期对舟曲幸存者问卷调查研究资料,选择了在性别和民族等变量上基本均衡的幸存者作为访谈对象。所有被试年龄大于12岁,为经历过舟曲泥石流灾害的舟曲本地人,具有基本的表达、阅读和书写能力并自愿参加本研究。由于4名访谈对象的基本资料缺失,最后纳入结果分析的访谈对象为59名,平均年龄为 34.63 ± 10.67 岁,具体情况见表1。

受访者中84.62%目睹或接触过尸体,74.36%目睹了房屋损毁,87.18%经历了亲属或朋友的死亡,56.41%在泥石流中有被困的经历,时间从1小时到48小时不等。71.79%的受访者住房已完全无法使用,所有受访者均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

1.2 研究方法-访谈法

1.2.1 访谈提纲 访谈为半结构式访谈,访谈提纲围绕创伤后成长量表(PTGI)中提出的五个维度展开:1、感激和珍惜;2、人际关系;3、新的可能性;4、个体优势;5、精神信念。访谈过程中如被试无法继续进行访谈,访谈者应按照以上五个维度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提问,引导被试以保证访谈过程的流畅性。

1.2.2 访谈过程 访谈地点一般选为受访者家中,访谈时间约为20~30分钟。访谈前先让受访者了解访谈目的,征得其同意,随后进行访谈并对访谈内容进行现场录音。在访谈过程中,如受访者对问题有不解之处,访谈者会尽量使用通俗的语言进行解释,使受访者充分理解;如受访者有所补充,可在访谈过程中随时说出想法,以更充分获得受访者的相关信息;对于受访者的回答,访谈者都认真倾听,同时对其感受或观点及时澄清、确认,以保证资料的准确性和客观性。

1.2.3 访谈涉及的伦理学问题 访谈者与受访者建立良好关系,获得其信任并做好充分沟通,以受访者充分理解为前提,双方共同签订知情同意书。在讨论过程中,无论何原因,受访者有权随时拒绝谈论某个问题、中止访谈或退出。

表1 访谈对象基本情况(n=59)

		百分数(%)
性别	男	50.85
	女	49.15
民族	汉族	52.54
	藏族	47.46
婚姻状况	未婚	25.64
	已婚	66.67
	丧偶	7.69
受教育程度	小学	12.62
	初中	23.08
	高中/职高/中专	30.77
	大专	23.08
	大学及以上	10.26

1.3 资料分析-编码

访谈结束后,访谈者将录音转录为电子文档,总共约20万字文字资料。

以个案为单位将每个受访者的访谈文字资料导入Nvivo8.0软件,运用该软件对转录的文字资料进行编码。

首先抽取20名被试的访谈资料,由两名编码者进行编码,2位编码者在讨论并达成一致意见后,初步形成编码手册。后期的编码均在此编码手册基础上完成。随后根据该编码手册对剩余访谈资料进行编码,并在编码的过程中进行了少量的补充和修改,使各个条目表意更清晰,最终的编码手册包括7个一级分类,26个二级分类。

2 结 果

2.1 对编码手册的描述

最终的编码手册由四个层级组成,其中一级分类7个(感激、珍惜、利他行为、人际关系改善、生活

的积极改变和新的计划、积极的自我感知、积极信念),二级分类 26 个。编码手册中三级分类及以下的条目均根据被试的直接描述总结而成,仅在具体细节方面有所差别,在编码手册中均详细列出,为后续编制量表做参考。

各一级分类的编码一致性在 0.675~0.855 之间。100%的受访者在访谈中均表示自己在经历灾难后出现了积极的变化。在一级分类中,被提及最多的三个维度为积极信念、人际关系的改善和珍惜。具体结果见表 2。

表 2 编码手册各条目分布情况(n=59)

编码分类	提及被试数	百分比(%)	提及频次
积极信念	52	88.14	146
社会	25	42.37	33
宗教	4	6.78	5
个体领悟	43	72.88	110
坚韧性	29	49.15	51
乐观和希望	13	22.03	17
人际和谐	16	27.12	20
信任	19	32.20	24
人际关系改善	50	84.75	119
共情增加	11	18.64	11
原谅	15	25.42	20
互动增多	32	54.24	55
亲密感增加	26	44.07	32
其他	2	3.39	2
珍惜	49	83.05	105
珍惜感情	16	27.12	18
珍惜生命和生活	47	79.66	87
感激	42	71.19	86
感激社会	34	57.63	57
感激他人	23	38.98	30
生活的积极改变和新的计划	42	71.19	95
新的兴趣	8	13.56	9
新的生活目标	40	67.80	78
学习	10	16.95	12
发展事业	25	42.37	31
养育照料	12	20.34	13
调整生活	18	30.51	23
新的经验	8	13.56	8
防灾经验	3	5.08	3
逃生经验	5	8.47	5
积极的自我感知	33	55.93	78
积极乐观	7	11.86	8
努力认真	4	6.78	4
平和	12	20.34	25
忍耐谨慎	2	3.39	5
成熟自立	23	38.98	35
豁达	6	10.17	11
其他	2	3.39	2
利他行为	25	42.37	43
帮助	22	37.29	31
报答	3	5.08	5
公益服务	2	3.39	4
其他	2	3.39	3

2.2 创伤后成长的维度

基于访谈资料的分析和比较,本研究归纳出 PTG 的七个维度,分别为:积极信念、生活的积极改变和新的计划、利他行为、积极的自我感知、感激、珍

惜和人际关系改善。访谈原始资料摘录见表 3。

2.2.1 积极信念 本研究将“积极信念”定义为受访者因经历灾难性事件而在世界观、价值观和对社会、宗教信仰以及自身的认知方面具有积极意义的任何想法。但其仅停留在精神层面,尚未付诸实践或无具体的行为支持,与人际关系改善和积极的自我感知维度相区分。88.14%(n=52)的受访者表达出了积极信念。其主要从自身角度出发,包括对人际关系、性格和未来生活的积极观念,受访者希望在以后的生活中自力更生,更加认真努力;对他人应更加信任;在人际关系中应该更为宽容、体谅;面对现实并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信心和希望。一部分受访者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对社会整体的认知更为积极。然而很少有受访者在宗教信仰上产生更为积极的观念,仅有 4 名藏族幸存者提到会对藏传佛教更为虔诚。

2.2.2 人际关系改善 84.75%(n=50)的受访者提及经历灾难后人际关系得到改善,包括互动增多、亲密感增加、原谅和共情增加。部分受访者在灾难后感受到与亲人、朋友、邻居的互动增多,主要表现为情感交流增多,双方更为关心对方、联系更频繁,也更愿意帮助对方。还有受访者在灾难过后感受到与他人的关系更为紧密。除此之外,一些受访者在灾难过后对他人更为宽容,在人际关系中不再过分计较。部分受访者在灾后共情增加,学会体谅与同情并从他人角度考虑问题。

2.2.3 珍惜 幸存者大多有亲眼目睹建筑物或财物,甚至生命在短时间内逝去的经历,这些经历可能对他们造成一定的创伤,然而正是这种富有冲击力的体验,也会让他们对目前所拥有的更为珍惜。在本研究中,83.05%(n=49)的受访者提到了“珍惜”,主要是珍惜生命、生活以及亲人朋友之间的情谊。而伴随着对于生命和情感联结的珍惜,受访者对金钱的态度也会发生改变。一些受访者提到不再过分节约而要学会享受生活。

2.2.4 感激 在灾难过后,政府及其他组织对幸存者提供了一定的帮助。本研究中 71.19%(n=42)的受访者表达了对提供救援的政府及个人的感激。

2.2.5 生活的积极改变和新的计划 灾后幸存者在面对家园被毁,财物丧失的境况,可能会出现被动接受救助,勉强度日的心理。然而部分幸存者却能体验到生活中发生的积极变化,并对未来的生活进行新的规划。本研究中,71.19%(n=42)的受访者在灾后产生了新的生活目标、兴趣或获得了新的经验。该维度的成长主要集中在重新找到生活的目标或制定新

的计划方面。有些受访者希望能投入更多的精力发展事业或学业；还有一些受访者在灾难过后将重心转移到建设家庭和加强与他人的情感联结上；除此之外，丧亲体验让部分受访者意识到养育的责任，并将其作为未来一段时间内的生活目标。一些受访者培养了新的兴趣，如旅游、写日记、打太极拳等。在经历了灾难的发生、逃生以及灾后的生存之后，一些受访者积累了逃生及防灾的经验。

2.2.6 积极的自我感知 在经历过灾难性创伤事件后，因众多新的体验与经历，个体对自身的认知会得到更新，其中积极取向形成了PTG中积极的自我感知维度。在本研究中，55.93% (n=33)的受访者感知到自身的新优点，主要为感觉自己更成熟自立，心态更为平和豁达，做事更努力认真、忍耐谨慎，对待事

物更积极乐观等。

2.2.7 利他行为 指遭受灾难性创伤事件的个体在灾后产生的帮助或报答的行为或意愿。本研究中，42.37% (n=25)的受访者希望参加公益活动或报答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

2.3 不同性别、不同民族创伤后成长比较

卡方检验结果显示所有条目被提及的个案数在不同性别之间均无统计显著性。在不同民族之间，更多的藏族受访者感知到在积极信念-宗教、生活的积极改变和新的计划-新的兴趣、利他行为-帮助这三个条目上产生了积极的变化，而更多的汉族受访者感知到自己在积极信念-个体领悟-坚韧性条目上有积极的变化，具体结果见表4。

表3 部分条目在访谈原始资料中的表述

编码分类	访谈原始资料中的表述
积极信念	
社会	很快生活都会恢复正常，这个很不容易的，这个也是社会的进步
宗教	对藏传佛教，我一直都是很虔诚了，通过这个事情后，我还会更虔诚的
个人领悟	别人能做的，咱们要继续做，咱们能做的，就去做嘛，能做的更好就去奋斗呗
人际关系改善	
互动增多	以前好像工作比较忙，跟老人们的交流好像不太多，现在跟他们交流的时间挺多的
亲密感增加	经历了这个事情以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好像更加亲近
原谅	邻居之间可能会为了路啊，可能会说这个是我的路，有时候倒个水啊扔个垃圾啊，都会互相争执，通过这次以后，这方面都已经消除了
共情增加	我现在觉得比以前更会去理解、谅解
珍惜	
珍惜感情	现在就是挺珍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珍惜生命和生活	感觉生命真的很可贵
感激	你们这些志愿者服务态度好，对我们也是非常尊重，对我们确实也是一片热心，这是我对你们最大的感谢
生活的积极改变和新的计划	
新的生活目标	家庭团结这就是真正的生活的目标
新的兴趣	在空闲时间我喜欢调整心情打太极拳，可以锻炼身体也可以调整心态。
新的经验	经过了地震，现在就知道怎么样才能防护、怎么样能自救。
积极的自我感知	经历了事情特别多就成长的特别快，成熟了，然后面对很多问题的时候，可能也就自己会去很好的把它解决。
利他行为	还是得多做些公益性的事业比较踏实

表4 不同民族创伤后成长差异 (n=59)

条目内容	被提及个案数		χ ²	P	
	汉族	藏族			
积极信念	宗教	0	4	4.768	0.029*
生活的积极改变和新的计划	新的兴趣	1	7	5.916	0.015*
利他行为	帮助	7	15	6.038	0.014*
积极信念	个体领悟-坚韧性	19	10	3.841	0.050*

注：*P<0.05

3 讨 论

3.1 创伤后成长的表达

本研究受访者均表达了PTG，较以往研究偏高，以往研究^[2]中PTG的发生率浮动在2%~98%之间。这可能与资料收集方式不同有关。本研究的访谈均

围绕PTG，因此访谈过程会明确引导受访者思考自身的积极变化。PTG概念本身就承认个体有从灾难创伤中自我恢复并成长的力量，这也提示即使缺乏专业的心理干预，积极导向的访谈可促使灾后幸存者从新的视角重新思考灾难对自身的积极影响，有助于其心理恢复。

3.2 创伤后成长的文化差异

与PTGI相比，本研究得出的各维度与其有一部分共性，如受访者均表达了对自身的积极感知，对生活生命的珍惜，在精神上有所变化等。但无论在总体还是各维度上，本研究结果均显示出相异于PTGI

的特点。

3.2.1 宗教与利他行为 本研究中仅有 6.78% 的受访者提到在灾难后对宗教信仰更虔诚, 在 PTGI 的“精神改变”分量表中, 相关条目为“我对宗教的信念更坚定”。而本研究的维度之一“利他行为”并未出现在 PTGI 中。可能的原因为中西方文化对宗教的理解不同, 在西方文化下利他行为被归为宗教范畴, 但在中国两者并无明显关联。针对中国烧伤患者的访谈研究^[15]也支持了这一结果。这也提示了在翻译修订国外量表时, 类似内容在不同文化中的表述和理解差异较大, 单纯的翻译和回译并不能完全解决这一问题。

3.2.2 创伤后成长多样化 本研究分析所得的 PTG 编码手册包括 7 个一级条目, 26 个二级条目, 而三级以下条目则超过 100 个, 其涵盖内容较 PTGI 更广泛。如在个人成长方面, PTGI 中仅提到更强大, 解决问题能力更强, 而在本研究中, 受访者还感知到自身更成熟、更自信、坚强、自立、宽容等。除此之外, 对社会和他人的感激、面对现实重建家园、在工作学习上树立新目标等都是本研究中被提及频次较高的创伤后成长内容, 而这些在 PTGI 中均未得到体现。PTGI 的编制和五因素模型的建立是基于以往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3], 利用二手资料会导致信息的遗漏或曲解。而其余文章对 PTG 测量的修订改进基本都基于 PTGI, 为自上而下的加工。而本研究使用访谈法, 真实记录灾难幸存者感知到的积极变化, 并以此为基础整理归纳得出创伤后成长编码手册, 信息量完整且真实, 为自下而上加工。这可为上述差异提供解释。

3.3 创伤后成长的性别、民族差异

卡方检验显示本研究中 PTG 各条目被提及的受访者数在不同性别间无显著差异。PTGI 量表编制时的统计结果显示女性得分更高^[3], 并得到了随后研究结果的支持^[2,18], 然而也有研究^[19,20]显示 PTG 在性别间无显著差异或男性的 PTGI 得分更高。PTGI 得分代表创伤后成长程度, 而本研究以发生率为度量, 因此两者的可比性有待商榷。

在藏汉两族间的卡方检验结果显示, 汉藏受访者在四个条目上的提及个案数有显著差异, 可能的解释为即使生活在同一地区, 不同民族的宗教认同度不同, 藏族对宗教的认同度普遍高于汉族^[21]。生活方式以及外界的介入也可能对此产生影响。虽然汉藏两族存在上述差异, 但样本量有限, 因此其代表性也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参 考 文 献

- 1 Tedeschi RG, Park L, Calhoun LG. Posttraumatic growth: Positive changes in the aftermath of crisis.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1998
- 2 Linley P, Joseph S. Positive change following trauma and adversity: A review.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2004, 17 (1): 11-21
- 3 Tedeschi RG, Calhoun LG. The 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1996, 9(3): 455-471
- 4 Weiss T. Posttraumatic growth in women with breast cancer and their husbands: An intersubjective validation study. *Journal of Psychosocial Oncology*, 2002, 20: 65-80
- 5 Polatinsky S, Esprey Y. An assessment of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perception of benefit resulting from the loss of a child.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2000, 13: 109-118
- 6 Davis CG, Nolen-Hoeksema S, Larson J. Making sense of loss and benefiting from the experience: The construals of mean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8, 75: 561-514
- 7 McMillen C, Smith M., Fisher H. Perceived benefit and mental health after three types of disaster.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1997, 65: 133-739
- 8 Zoellner T, Maercker A. Posttraumatic growth in clinical psychology — A critical review and introduction of a two component model.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2006, 26(5): 626-653
- 9 Marsella AJ, Christopher MA. Ethnocultural considerations in disasters: An overview of research issues and directions. *Psychiatric Clinics of North America*, 2004, 27: 521-539
- 10 Morris A, Shakespeare-Finch J, Rieck M, Newbery J. Multidimensional nature of posttraumatic growth in an Australian population.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2005, 18: 575-585
- 11 Taku K, Tedeschi RG, Calhoun LG, et al. Examining post-traumatic growth among Japa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Anxiety, Stress and Coping*, 2007, 20: 353-367
- 12 Ho SMY, Chan CLW, Ho RTH. Posttraumatic growth in Chinese cancer survivors. *Psycho-Oncology*, 2004, 13: 377-389
- 13 Dirik G, Karanci AN. Variables related to posttraumatic growth in Turkish rheumatoid arthritis patients.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in Medical Settings*, 2008, 15: 193-203
- 14 Kanako TAKU, Tedeschi RG, Cann A, et al. The Culture of Disclosure: effects of perceived reactions to disclosure on posttraumatic growth and distress in Japan.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2009, 28(10): 1226-1243
- 15 翟建霞, 蒋红, 吴菁, 等. 严重烧伤患者创伤后成长的质性研究. *中华护理杂志*, 2011, 46(7): 694-696

(下转第 445 页)

2.2.3 自我同一性的调节效应分析 根据国内学者提出的调节效应的检验程序分别进行承诺和愿望的调节效应检验^[15]。结果显示,只有愿望在存在焦虑对抑郁的关系中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结果见表5。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存在焦虑中死亡与命运焦虑对大学生抑郁影响最大。这与国外的研究结果有所不同。Weems 等人发现,对大学生而言,无意义和空虚焦虑对抑郁的预测力最大^[7]。这可能与中美两国的当前社会经济形势有关。对中国大学生而言,一方面,中国社会处于转型阶段,社会变化加快,不确定因素增加,年轻学生面对的前途更具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当前中国大学生的就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因担心就业和前途命运而产生较大抑郁情绪不言而喻。而美国社会富裕程度高且相对稳定,精神层面的意义感问题遂可能成为大学生普遍关注的问题。

本研究还发现,自我同一性在存在焦虑对抑郁的影响中起到双重作用。具体而言,承诺在存在焦虑对抑郁的影响中起到负向中介作用,而愿望在存在焦虑对抑郁的影响中起到负向调节作用。承诺的中介作用,说明存在焦虑对抑郁有间接的负效应。其作用机制可能是,大学生的存在焦虑水平高,往往导致其无法为自己的目标全身心投入,而无法为目标全身心投入,又使抑郁情绪升高。愿望,即将来的投入愿望,指个体是否认真思考将来努力的方向,是否认为自己能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同时正在比较几种可能的选择并认真地思考这些选择。这些认知方面的探索,其实是初步确定生命的意义性,并积极探索未来的生活道路。这种认知上的积极调节可能导致抑郁情绪的改善。这符合贝克的抑郁认知理论。国内对大学生的研究也发现,大学生积极的认知情绪策略可以有效地缓解抑郁^[16]。

参 考 文 献

- 1 杨鑫辉. 心理学通史(第五卷).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0
- 2 杨韶刚. 寻找存在的真谛.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
- 3 车文博. 人本主义心理学.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3
- 4 Good LR, Good KC. A preliminary measure of existential anxiety. *Psychology Report*, 1974, 34: 72-74
- 5 Bylski NC, Westman AS. Relationships among defense style, existential anxiety, and religiosity. *Psychological Report*, 1991, 68: 1389-1390
- 6 樊富珉,王建忠. 北京大学生心理素质与心理健康研究.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01, 22(4): 30-36
- 7 Weems CF, Costa NM, Dehon C, Berman SL. Paul Tillich's theory of existential anxiety: A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Anxiety, Stress and Coping*, 2004, 17: 383-399
- 8 Berman SL, Weems CF, Stickle TR. Existential anxiety in adolescents: Prevalence, structure, association with psychological symptoms and identity development.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2006, 35(3): 303-310
- 9 王树青,石猛,陈会昌. 大学生自我同一性的发展及与情绪适应的关系.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0, 18(2): 215-218
- 10 张日昇. 同一性与青年期同一性地位的研究—同一性地位的构成及其自我测定. *心理科学*, 2000, 23(4): 430-434, 510
- 11 曾庆,陈英. 大学新生自我同一性及心理健康状况分析.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1, 19(4): 546-547, 550
- 12 徐红红,洪炜. 188名医学新生的自我同一性及其与人格、心理健康的相关性.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7, 21(11): 743-746
- 13 陈坚,王东宇. 大学生自我同一性发展与存在焦虑的关系. *心理与行为研究*, 2010, 8(3): 235-240
- 14 汪卫东,王希林,马弘.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 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 1999
- 15 温忠麟,侯杰泰,张雷. 调节效应与中介效应的比较和应用. *心理学报*, 2005, 37(2): 268-274
- 16 魏义梅,付桂芳. 大学生认知情绪调节与抑郁的关系.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8, 16(1): 68-70

(收稿日期:2012-12-05)

(上接第478页)

- 16 高隽,王冕,邓晶,等. 创伤后成长量表在经历汶川地震初中生中的修订与初步应用.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0, 24(2): 126-130
- 17 陈悦,甘怡群,黄淑慧,等. 创伤后成长评定量表在汶川地震灾民中的修订与初步应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2, 20(3): 336-339
- 18 Alia I Sheikh. Posttraumatic growth in trauma survivors: Implications for practice. *Counselling Psychology Quarterly*,

2008, 21(1): 85-97

- 19 Milam J, Olson A, Unger J. Posttraumatic growth among adolescents. *Journal of Adolescent Research*, 2004, 19: 192-204
- 20 杨寅,钱铭怡,李松蔚,等. 汶川地震受灾民众创伤后成长及其影响因素.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2, 20(1): 69-72
- 21 杨俊龙. 汉、回、藏族中学生宗教认同的跨文化研究. 甘肃: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2007. 30-36

(收稿日期:2012-10-29)